

三五年是多久

世界上有多少鲜明、生动、细腻、委婉的语言，但哪种语言能把老苏区人民怀念毛主席的心情表达出来啊？

世界上有多少有才华的民间艺人和作家，说出了、唱出了、写出了多少感人的故事和作品；但哪个民间艺人和作家，能把老苏区人民盼望毛主席归来的心情，说出来，唱出来，写出来呢？

没有。

这种不能言传的心情，只有令人用自己的心去领会，去感受吧。

但我却还要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：

瑞金有个老贫农，他的名字叫刘惟麟。

一天傍晚，他坐在绵江岸上的柚子树下，满树垂着深绿色的袖子。他那恬淡的面孔上，满布着饱经风霜的皱纹，眼睛凝视着一望无际的金色的

稻子。一个牧羊的孩子，坐在他身旁，照料着吃草的小羊。

绵江的水、徐徐地、无声地流着。周围一片静穆。老人不紧不慢、自言自语似地说起来：

毛主席当年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地种，有屋住，有饭吃，有衣穿……样样都好。

一九三四年，有一天，忽然天变了，黑云把太阳遮起来。不知什么人，也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：

“红军要走了，毛主席要走了！”

我们就像坍了天，都不愿相信。

说话之间，毛主席真要走了！临走时，紧紧握着我们手说：

同志，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我们终要胜利的！红军要回来的，我们要回来的，三五年就回来的！

说着就走了。我们就像坍了天……

反动派来了，带着恶霸地主来了，带着特务流氓来了。把土地夺去了，把东西抢走了，把房屋烧光了 把人活埋了。

毛主席走了，我们真正坍了天。

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！在血火里回想着当

年的好光景。在血火里想念着红军，想念共产党，想念毛主席。在血火里想着毛主席临走时对我们说的话。

同志，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我们要胜利的！红军要回来的，我们要回来的，三五年就回来的！

在血火里想着这些，就觉得红军和毛主席没有走，觉得同当年一样，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在血火里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斗争到胜利！

那血火好惨啊。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！

血火里，我们想念红军，想念共产党，想念毛主席。我们的天塌了。毛主席啊，我们由春望到夏，由秋望到冬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“三五年……”

这“三五年”是多久呢？

啊，是了，“三五年”，就是一九三五年！明年就回来了！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斗争到胜利！毛主席明年就回来了！

可是……

一九三五年过去了，红军不见回来，毛主席不见回来。

那血火好惨啊。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！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！

血火里，想念红军，想念共产党，想念毛主席。我们的天塌了。毛主席啊，我们由春望到夏，由秋望到冬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“三五年……”

这“三五年”有多久呢？

啊，是了，“三五年”，就是三年或五年。三年或五年就回来了！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斗争到胜利！毛主席三年或五年就回来了！

可是……

三年过去了，五年过去了，毛主席不见回来。

那血火好惨啊。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！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！

血火里，想念红军，想念共产党，想念毛主席

席。我们的天塌了。毛主席啊，我们由春望到夏，由秋望到冬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“三五年……”

这“三五年”是多久呢？

啊，是了，“三五年”就是三年加五年，八年！八年就回来了！坚持下去，斗争下去，斗争到胜利！毛主席八年就回来了！

可是……

八年过去了，毛主席不见回来。

啊，那血火好惨啊，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！

血火里，想念红军，想念共产党，想念毛主席。我们的天塌了。毛主席啊，我们由春望到夏，由秋望到冬，眼睛都望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“三五年……”

这“三五年”到底有多久呢？

忽然间，霹雳一声，天空的黑云散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红军——人民解放军来了，共产党来了，反动派同它的特务流氓滚了，恶霸地主斗倒了。

啊！“三五年”，这多巧啊，一九三四到一九四九，正好三五一十五年啊！红军——人民解放军终于回来了！从血火里熬过来的人民，欢天喜地地重建起家园了！

只是毛主席还没有同红军——人民解放军一起回来。毛主席啊，你使我们重见了天日，我们怀着火一般的心在想念你，想念你回到当年你手创的红都——瑞金来。

……不知哪月哪日，也不知何人从何处传来一个消息。这消息好比一阵春风，把老苏区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的心，都吹得一齐开了花，把老苏区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脸上都吹得堆满了笑，笑得连嘴都抿不住地奔走相告着：

“毛主席派人来看我们来了，派访问团来访问我们来了！他本来要同红军——人民解放军一起来的，因为他日日夜夜忙着替全中国人民办些大事，走不开，于是就派人来代他看我们来了。不但派人来看我们，还派了电影队、文工团、曲艺队给我们演节目，派了医疗队给我们治病……啊，谁

瑞金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。

能像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？……”

没有……

访问团来了，带着毛主席的照片来了，带着毛主席的像章来了，带着毛主席亲笔给我们的题字来了：

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！

我们小心地把毛主席的照片挂到屋子正中央，把毛主席的像章缀到胸前，把毛主席给我们题的字：

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！

深深地、深深地、千秋万代都磨不去地刻到我们的心上！

锦江的水，徐徐地、无声地流着。树上的柚子，静静地垂着。老人恬淡的面孔上，堆满了笑，凝视着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子。远山上隐隐约约送来一阵阵的《东方红》的歌声。夕阳的余辉，把

大地涂上了一层金色。羊儿吃饱了草，安闲地卧在牧童身旁，望着牧童的脸。牧童坐在老人身旁，静静地、凝神地听着老人的故事……

一九五一年八月，于瑞金

罗汉岭前吊秋白

瞿秋白同志被害后，因当时消息被封锁，报纸仅略作捕风捉影、语焉不详，甚至歪曲造谣的报道外，长期间，寂无声息。中国人民，尤其是党所领导的文艺界，得此噩耗后，怀着无限沉痛悲愤的心情，对秋白同志只能默默悼念而已。他的牺牲，信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在文化上的损失，真是无可比喻。”

多年来，我总幻想着能到长汀作一次访问，但当年那只不过是痴人的梦想罢了。

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。

一九五一年夏，我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，赴江西访问。我们的工作地区，是以瑞金为中心的赣东南几县，秋白同志就义地的长汀，却不在内。可是我依然去作了一次访问。

八月二十四日清晨，我乘一辆军用吉普，离开瑞金，沿着河谷一直向东，越过崇山峻岭，于早九时二十分，到达长汀。这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。

车直抵长汀西街县人民政府。我们述明来意，县秘书立即邀来张仁福和刘玉堂两位同志。

张仁福是职业抬棺人，是当年亲殓秋白，替秋白抬棺人之一，现年五十八岁，住长汀西街。其他三个抬棺人，早已没有下落。刘玉堂是贫农，拾粪人，现年四十七岁，住距城约五里之黄田背村。这是现在能找到秋白就义时仅有的两位目击者。

长汀中学西，有一小公园，苏维埃时期名列宁公园，敌人占领后，改名中山公园。这是秋白就义时用“刑餐”的地方。

由此往西，距城约半里许，公路北有一座小山，名罗汉岭，岭并不高。岭脚及山腰处，荒冢累累，气象森严。岭前有一小草坪，紧临公路。这原为清末收容无依聋盲老人的养济院废址。现虽成草坪，但仍有屋基可辨。草坪正中，即秋白

就义地。

由此往西，不及一里处，公路以北，丘陵起伏，名盘龙岗，为秋白墓穴所在地。遗骸今年七月由长汀县府起出，装入瓷坛内，放置县府。墓仅剩一穴，黄土乱砖，堆积穴旁，土色甚新，宛如新近所掘者。

据张仁福说：秋白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，在长汀东南约九十里之水口，因众寡不敌，被国民党武平保安团长钟绍葵部所俘。被俘后，押至长汀，囚伪三十六师宋希濂司令部内（在西街当年福建省立第七中学）。当时居民不知被押者为何人。

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，将“囚人”押至中山公园用刑餐，园内虽未驻兵，但因囚人用刑餐，门禁森严，居民不准入内，故当时园中情况，毫无所知。隔墙闻有《国际歌》歌声。

当日上午约十时，刽子手将囚人押往刑场，未绑。囚人着小衫、短裤、鞋袜。意态从容，行至罗汉岭前的靠山脚处草坪正中间，面对罗汉岭，盘足而坐。刽子手是宋希濂的卫士，用盒子枪从背后射击，一弹毙命。事后，居民见布告，始知被害

人为瞿秋白同志。

被难后，露尸至午后四时左右，始有人送棺木一口，张仁福说，他亲自代为装殓，并抬至盘龙岗埋葬。

拾粪人刘玉堂说，他当日上午，同平常一样，进城拾粪。由西街经过时，正遇秋白就义。所述目击详情，与张仁福同。

最后，县秘书补充说，秋白同志被囚期间，在敌人法庭上说：“我一生献身革命，现在被俘，只有死而后已。我一个人倒下去，但是，千百万人民，会站起来，继续前进！”

午后四时半，我们离开长汀。夕阳里，汽车徐徐驶过了秋白的就义地，直向瑞金驶去了。

罗汉岭慢慢儿留在身后，秋白的面影，浮在我的心头，秋白的声音，萦绕在我的耳边。半生往事，均历历在目……

秋白，那是一九二二年吧，我们在莫斯科，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，说你顶多能支持三两年。但你总不肯休息。讲课时，有时累得面色苍白，连气都接不上来了，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。后来真不能支持了，

就在莫斯科近郊高山疗养院疗养，我同素园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，你从来总是兴奋得忘了病，忘了一切，口若悬河地谈论着。你说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，你要拚着你的病弱的生命，把革命的宝贝尽量运到祖国来……

你那时躺到床上，床头没有台灯，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，拴到床架上，俯到枕上写文章。你说，病是要养的，可是书更要读，工作更要做，不能不做。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肆造谣，说什么“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将崩溃”，正在这时候，你却扶病写了《共产主义的人间化》、《莫斯科的赤潮》等通讯，把苏联实况，介绍给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，替他们扫除了资产阶级报纸对苏联散布的迷雾，使他们知道了列宁所创建的苏维埃社会的真实情况。对全世界说来，这些热情洋溢的真实报道，正是“拨云雾而见青天”啊！

秋白，一九二三年初，你回国后，住在北京黄化门西妞妞房你的叔叔家里。我常去看你，有一次，我把我的第一篇译稿——契诃夫的独幕剧《蠢货》交给你，你看了就在你主编的党的机关刊

物《新青年》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。这给了我多大鼓励啊。你叫我多学习，多介绍，你说中国文艺田园太贫瘠了，教我作一个引水运肥的“农夫”。

我记得，你住的是一个跨院，有两小间房，外间靠门口的隔壁跟前，放着一张小风琴。你那时正在译《国际歌》，仔细斟酌好了一句，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，要使歌词能恰当地配合乐谱。你说《国际歌》当时已经有三种译文，可是没有一种译得像样，更谈不到能唱了。你要把它译得能唱，使它在中国人民口头上传播开去。最令我敬佩的是外文“国际”一词，在外文是那么长的一串音节，而在汉语却只有“国际”两个音，这怎么能使它配上原谱呢？你说这个字在西欧各种文字都是同音，是国际语，所以汉语也应该相同。你采用了音译“英特纳雄纳尔”，解决了这一难题。并且认为这样在唱时可和各国之音一致，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，得以同声相应，收万口同声，情感交融之效。在译作时，你是这样深刻地思考、处理问题的啊。你不但是中国人民杰出的战士，而且是杰出的人才。你记得

吗？一九二二年中国春节时，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俱乐部参加演出的那一个独幕趣剧，连苏联同志对你演的角色，都大为惊叹不已！

本来，你回北京后，由李大钊同志介绍，请你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，可是反动的北大教务长顾某，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始终不发聘书。过了一个时期，你等不着，就到上海去了……在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。

秋白，我在学习俄语过程中，常把遇到的困难，特别是原意懂而中文难于表达得恰当的那些词句，向你请教。有一次，我随便提到契诃夫剧本中两个人物吵嘴时那样最普通的例子，如：“*Бидали мы*”，我照直译为“我们见过的”，你改为“我们见识过的”。这些小节，将近四十年了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加一个字，显得多么活现！你后来把极艰深枯燥的哲学论文，译得那末细腻、委婉、动人！诚如鲁迅先生所称赞的，“信而且达，并世无两”。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，仗着你那生花之笔，在中国广大读者的心中生根、开花了。

那是一九二四年吧，你在上海，我把我的译稿

——契诃夫的《三姊妹》，寄给你看，你看后，改了一些地方，交给郑振铎，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了。那时你写信说你完全用药养着命，在极端艰险条件下，从事革命工作。我每逢写信向你请教时，每个问题你都作详细的解答，有时甚至是长篇大论地阐述。

一九二七年，中国大革命失败后，我出走莫斯科，不久你也到了那里。旧地逢故人，万感交集，真不知话从哪里说起！一天傍晚，我们在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，你谈到我走后武汉各方面的情况……王一飞同志被害了，罗觉（一农）同志被害了……最后你谈到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，你教我专力在这方面工作。你说应当把介绍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，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，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，是政治的远见，而不是偏爱啊。

一九二九年，有一次，我从列宁格勒到了莫斯科，临走前，到你住的地方——留克斯饭店看你。你总是像从来那样昂扬，那样忘我地为中国人民、中国革命打算。你谈笑风生，热情洋溢地谈

起文艺大众化问题，谈得使我差点儿误了火车。

是一九二九年深秋吧，你回国前，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，在我家里畅叙半日，不意那次相会，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！

你回国后，直到一九三三年我回国以前，这期间，在反动派对苏联封锁的情况下，你同鲁迅先生想尽方法，经常往列宁格勒给我寄书刊。其中有你们办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，如《文学导报》、《十字街头》、《文学月报》、《前哨》等等。我在那些刊物上辨出了你在白色恐怖下，用宋阳、易嘉、范易嘉等等笔名，写出的火焰般的、战斗的文艺作品、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。

那时我也不断寄些苏联的书报，托鲁迅先生转给你，有时为防特务没收，每种寄双份，甚至寄三份，分批寄，或经西欧转寄。用尽心思，要逃过反动派的没收，把苏联的革命书刊寄到你手里。记得有一次，你收到革拉特科夫的长篇《新土地》时，很快就译了出来，并且写信说：“此书已译好，交商务印行，出版时，我要写一篇序文印在书前，这序文只有五个大字，就是：‘并非乌托邦’”。谁知你无限心血凝成的这部译稿，在一九三二年一